



引用格式:丁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潜在超越[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2):16-2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2.02.00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2)02-0016-08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潜在超越

Marx's potential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 from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丁颖

DING Ying

徐州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感性活动;
费尔巴哈;
潜在超越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不仅是理解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真正钥匙,也是对青年马克思和晚期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以及对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断裂问题的科学解答。在该部分中,马克思生成了感性活动的哲学境域,通过对费尔巴哈理论贡献的高度评价,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确立了超越整个旧哲学的理论基点,同时也潜在地展现了对费尔巴哈的内在超越。

[收稿日期]2021-08-2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后期资助项目(20HQ007)

[作者简介]丁颖(1984—),男,江苏省徐州市人,徐州工程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197}这一部分,可谓是理解马克思这部论著中的哲学思想的钥匙;对这一部分的重视程度以及理解深度决定了对整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定位。从思想史发展维度看,这也关涉着能否对“双重断裂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和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断裂——作出科学解答。而之所以会造成“双重断裂论”的理论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费尔巴哈因素的定位。留存下来的手稿“足以证明马克思在写《巴黎手稿》最重要的几章时曾大量借用了费尔巴哈的观点”^[2]。在该部分中,马克思借由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态度,同时在理论层面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本性进行了公开的指责,这一部分不仅仅是马克思对其哲学立场的反思,还延续了经济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论逻辑。基于此,马克思所发动的全新的哲学革命才有了鲜明的理论基点。但是同样在该部分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溢美之词”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人们据此将马克思视为费尔巴哈思想追随者。笔者认为,对这一部分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字面的含义,而应该沿着文本的逻辑追溯马克思的思想进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同时隐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根本界限,马克思正是借由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推崇表达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满。本文拟证实马克思不仅不赞成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而且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潜在超越。

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的评判及其引发的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就对费尔巴哈予以高度的评价。马克思

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和《哲学改革纲要》“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112}。因此有必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1]112}进行剖析,而对于这一批判之必要性,可以在“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中找到原因^{[1]114}。

随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的展开,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仅仅从语句中,我们就能深切感觉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之理论成就的叹服。在随后的描述中,马克思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并由此展开了对“黑格尔的体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释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1]200}

据此,即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伟大功绩”的评判,学术界不少学者将马克思视为费尔巴哈的追随者。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论,源于学术界部分学者仍然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定性为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作品。张一兵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内核的批判,找到国民经济中被李嘉图物性逻辑所遮蔽起来的对象化的劳动主体活动,从而生成了主体劳动的外化—对象性—异化—扬弃的否定辩证法构式,但是这一哲学批判构式依然孕育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史观之中^[3]。事实上,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对费尔巴哈哲

学的高度评价,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也由此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此时的马克思究竟是否完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学说?我们能否将马克思视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费尔巴哈者”呢?如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将此时的马克思划定为一个入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家,那么,我们会面临如下这些问题。

其一,如果此时的马克思还沉浸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园地中,其理论立场被归结为人本学唯物主义,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何差异?难道马克思只是在重复费尔巴哈的批判道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视为费尔巴哈理论批判的扩展和延续,即把国民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附加之物,就会重新陷入马克思理论中哲学与经济学分裂的误区中。

其二,如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的思想依然归属于费尔巴哈的哲学境域,那么为什么在数月之后,即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展开了全面的清算,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个思路清晰、思想严谨的学者何以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思想跃进?难道我们要像阿尔都塞一样将这一理论的跃进归结为某种“奇迹”、归结为“漫漫长夜”之后的“豁然开朗”?那样显然是难以服众的。但是,如果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其后马克思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之前是固守于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之后坚持的则是全新的哲学立场,如此一来,就难免会造成“两个马克思”的思想断裂。这种做法无疑是无助于把握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的完整性和一贯性的。

其三,如果我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视为固守于费尔巴哈哲学立场的著作,那么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如何通达到“整个哲学的批判”?依然被困于思辨本质的费尔巴哈是如何逃离马克思“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当然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这是成熟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分野,是从“黑暗”到黎明的过渡,但是我们显然不能用这种凌空飞渡的跃进来描述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进程。如果按照“断裂论”的模式无法解答,那么回归文本,我们看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其内容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展开批判,但是本质上是对思辨哲学之“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批判。费尔巴哈虽然深刻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本质,但是并没有超越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所以其哲学本质依然包含这种思辨性。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也难逃马克思对“整个哲学的批判”之维度。

面对如此众多问题,厘清费尔巴哈哲学之于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准确定位,就显得极为重要。马克思要想在黑格尔哲学最根基之处——思辨本质——吹响批判的号角,就必须明确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批判采用的形式之“颠倒”依然没有破除思辨哲学的迷雾,就必须明确地把费尔巴哈的哲学根基纳入“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的范畴中,而这一切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整个哲学的批判,其本质是意图动摇思辨哲学的根基,而这一动摇也必然会涉及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地基。

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的三重意蕴

当我们深入到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之中,把握住其批判的针对性是思辨哲学的根基时,我们就不应忽视马克思已然深刻洞察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这一事实。然而,依然有一个

问题困扰着我们,即为什么马克思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热忱呢?这种强烈的理论共鸣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产生的呢?这就需要我们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放回到文本中去细细品味了。

首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建立在与鲍威尔和施特劳斯进行比较的语境中,也就是说,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有条件、有限制的评价,如果我们脱离了语境妄加评论,往往会陷入语言的陷阱。马克思认为是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但是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建立在与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比较之基础上的,后者自以为完成了哲学上的创举,但其实依然停留在黑格尔的哲学地基中洋洋自得。马克思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直指其哲学的灵魂深处,这种颠覆已经超出了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如果没有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衬托,费尔巴哈的功绩也不会达到如此耀眼的地步。费尔巴哈的观点如此深刻,愈发反衬了停留于浮尘的鲍威尔和施特劳斯二人的浅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1]197}。这里所指出的“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的批判者就是指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革命者,他们不满意黑格尔哲学中保守的因素,意图超越黑格尔哲学,但是讽刺的是,他们手中的批判武器却完全来自于黑格尔哲学——他们依仗的批判材料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费尔巴哈则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1]199}。两相比较,高下立判,但是这个“高”是鲍威尔之等人衬托的,没有他们的“滑稽可笑”,也就无法凸显费尔巴哈的“严肃态度”。同样的笔触在《神圣家族》中得以延续,

马克思指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而原本的亲密战友鲍威尔呢?无论其观点多么激进,外在形式多么“革命”,依然是拘泥于“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依然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囚徒”,只有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完成在于全新的哲学地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构建,在其历史意义上,更是构成了对于“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我们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评价中发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所有的赞誉都伴随着对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人思想局限的批判。因此,如果空谈对费尔巴哈评价之高度,忽略了这种评价的相对性,就会陷入对费尔巴哈思想的盲目崇拜,就会简单地将马克思纳入到费尔巴哈思想的追随者,就会忽略马克思自身思想闪烁的光芒。

其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建立在把费尔巴哈视为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的基础上,因此这种评价必须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紧密联系起来。从“痛苦地”投身黑格尔哲学以来,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德国现实的洗礼,从而独立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哲学这条自我反思的道路上,有无数思想家贡献着自己的理性之光,其中,费尔巴哈作为重要的一环,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带入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可以说,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新的世界观,不仅是解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钥匙,更是瓦解整个形而上学的黎明光芒,忽视了这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不仅忽视了费尔巴哈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重要贡献,同样也将造成马克思思想发展重要环节的缺失。马克思指出:“只有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在这个领域

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199}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直指他们共同的批判对象——黑格尔思辨哲学。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1]200},这一指证从表面上看,阐释了哲学与宗教的一致性,但是真正的批判对象是黑格尔。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宗教不过是通过感性语言来把握绝对理性的方式,而哲学则是用思辨的语言来表达绝对理念,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费尔巴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得出“‘绝对’哲学的秘密,因此就是神学的秘密”^[4]的结论。而批判神学就意味着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谴责和批判,对于已经徘徊于黑格尔哲学园地边缘的马克思而言,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犹如一针“强心剂”,使得已经抬起一只脚的马克思,坚定地踏出这一步,稳固地站在新世界观的坚实地基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马克思之所以对费尔巴哈有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建立在对自身理论高度与费尔巴哈理论高度界限不明的基础上,或者说马克思过高评价了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理论成就。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是因为费尔巴哈确立了“感性对象性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拟定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路径,但这是结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原因,因为这一“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的。如果忽视了这个理论基础,那么对于“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的理解就可能产生偏差。我们从中既可以找到对黑格尔哲学根基的巨大颠覆和新世界观的理论引导,同样,也可能

造成理论的倒退——回到以物质本体论为根基的自然唯物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显然是前者,是把握了社会关系这个维度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在人与对象之间不再是主客之间的“敌视”关系,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的基础,决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因为这种“和解”依然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中的,自然不再是敌视人的、孤立的、自在的自然,而是作为人之本质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所呼唤的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当然,此时的费尔巴哈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深度,虽然他“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5],但是这仅仅是他直观之后的结论,仅仅是按照“感性对象性原则”所达成的必然结论。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会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人为什么是社会存在物?费尔巴哈并没有作出解答,或者说这样的问题还在费尔巴哈的理论视野之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赋予了费尔巴哈如此之高的评价,但是这一评价是建立在“感性活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眼中的“费尔巴哈”,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带着“审视目光”扫描自身的“马克思”。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对于“感性原则”和“对象性原则”的理论贡献,但是却误以为费尔巴哈已经洞悉了感性对象性关系生产的秘密——劳动,从而过高地评价了费尔巴哈。另外,当我们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之时间节点定位为1843年之后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开始接触不过两年时间,他之所以会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吸引并产生共鸣,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两者共同的批判对象——

黑格尔思辨哲学(虽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切入点是宗教批判,但是其理论深度以及批判的最终归宿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二是因为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由人”阵营的不满。正是在与鲍威尔和施特劳斯的比较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立足的全新哲学境域进行了高度评价,显然这一评价是建立在全新哲学境域的基础上的,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无意中把自身所达到的理论发现等同于费尔巴哈所达到的理论成就,忽视了两者的理论界限,正是这种忽视造成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伟大功绩”的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马克思在无意识间混淆了费尔巴哈与自己的理论界限,尤其是对于“感性对象性关系”与“感性对象性活动”之间差异的忽略,造成了对于费尔巴哈理论成就的过高赞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鲍威尔与施特劳斯等人非批判态度的不满也是造成过高赞誉的外部因素,种种原因延伸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立场归属的理论难题。只有透过浮于浅表的语言迷雾,把握真正的理论本质,才能避免两者冲突带来的不和谐局面;或者说,只有立足马克思所重新拟定的哲学立场,才能正确看待费尔巴哈的理论成就。当然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尤其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部分中,马克思在赞誉费尔巴哈“伟大功绩”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把其对费尔巴哈的不满逐渐公开。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潜在超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直言只有费尔巴哈才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的态度的人”^{[1]199}时,原本的亲密战友鲍威尔已经作为反面教材,来衬托费

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尤其是鲍威尔所从事的批判工作,更是引起了马克思的不满。对于这种非批判的态度,马克思认为仅仅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无论是批判的方式还是批判的内容,都没能和作为“母体”的黑格尔辩证法划清界限,只有费尔巴哈才“作出了真正的发现”,“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这段话处处透露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理论成就的赞誉,我们似乎也不由得为如此谦虚纯朴却成就非凡的理论家折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鲍威尔批判态度的尖酸讽刺中,马克思突然话锋一转,指出鲍威尔不仅没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批判划清界限,“甚至一点也没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1]199},马克思在这里似乎延续了对鲍威尔非批判态度的不满。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费尔巴哈的辩证法呢?就留存的史料而言,鲍威尔与费尔巴哈理论交锋的材料并不多。但是当我们重新在文本中检索时,会发现,马克思之所以在提及“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提到对于“费尔巴哈的辩证法”的批判,似乎也隐含着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理论的一点意见,而这点意见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得到延续和证实。

马克思在谈到费尔巴哈的功绩时,特别指出,“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1]200}。马克思所谓的这个“功绩”无疑指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许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窥视费尔巴哈辩证法的一丝端倪。

在费尔巴哈眼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从“实体”、从那个“绝对的不变的抽象”出发,或者说从唯一能够代表绝对理性的“上帝”出发,而这个“实体”“精神”“上帝”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开端,就是“肯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宗教和神学。宗教和神学在扬弃的过程中,“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

的东西”^{[1]200}。这个过程是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扬弃不是终点,最终残留下来的,作为否定之否定原则下返回自身的东西便是被恢复的宗教和神学。“仅仅”两个字看似微不足道,却道尽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宗教与神学扬弃自身又回到自身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的哲学与神学分裂而且对立了起来,这一点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不满。因为马克思之所以对费尔巴哈的“功绩”赞誉有加,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1]200},也就是说,宗教和哲学的统一才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共鸣点,只有承认了这一点,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批判才能上升到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才有可能站在黑格尔哲学园地之外俯瞰整个德国哲学。但是如果一如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哲学与宗教神学的分裂,直接造成了这种伟大理论发展趋势的倒退,那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又被放逐到黑格尔哲学园地的一角——宗教批判,这种批判的局限性显然有悖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评价——秉持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紧接着马克思继续评述,对于费尔巴哈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是“感性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在这里出现的便是费尔巴哈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武器”。那种感性确定的“肯定”与虚幻的、既无法证明自身又不被认同的“肯定”,这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费尔巴哈似乎为破除黑格尔辩证法中虚妄的本质找到了武器——感性的存在。然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马克思却阐释了自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部分内容是马克思自我反思的展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潜在的超越。虽然直接地看来,马克思在该手稿中

依然给予了费尔巴哈以高度评价,但是由于作为全新世界观根基的“感性活动”的生成,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内在超越已经实质地出现^[6]。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里呈现出的与其说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如说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真正精髓的提炼。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和规定所谓“感性”,从而以彻底瓦解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方式重新制定了存在论的基本纲领^[7]。当费尔巴哈从批判中发现了感性的存在时,马克思发现了被黑格尔哲学所触及的历史运动的“真相”。当然这个“真相”是“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201}。但是无疑历史运动离不开主体的自我实现,正是在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人类历史的宏大诗篇得以展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高度肯定了黑格尔的为人类历史作出的精彩总结,如果没有黑格尔深入到人类历史的维度,发掘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可能依然被解释为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之简单堆砌。但是这一“伟大成就”却被费尔巴哈忽略了,或者说,费尔巴哈以为只要站在“感性”的稳固地基上,整个黑格尔辩证法就自然崩塌了,他所忽略的恰恰是马克思眼中闪闪发光的“星辰”,即使这“星辰”掩藏在“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暗夜中。那么如何消解黑格尔哲学自身弥漫的思辨气质,马克思直击黑格尔的理论要害——“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201}。黑格尔所描绘的人类历史画卷,并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写生”,更像是反映精神世界的“抽象画”。黑格尔的历史主体并不是现实的人以及现实人的活动,而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和自

我实现的过程,人不过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1]291},因此与其说是人的历史,不如说是人的理念史,是作为理念的人从自我的抽象认知阶段上升到具体知识阶段的历史,因而是作为具体知识的人的“产生的活动”和“形成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不过是“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292}。

马克思由此就发现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从而确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自己哲学革命的必要性^[8]。这一深刻认识,已经暴露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理论水平的差距。若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经过《神圣家族》,特别是《评李斯特》,然后到《提纲》,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其哲学的基本范式^[9]。基于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待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就有了新的感悟。与鲍威尔等人相比,费尔巴哈确实是对黑格尔哲学秉持了真正严肃的批判的态度,这一点是依然受困于黑格尔哲学而不自知的鲍威尔等人所不能比拟的;但是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精髓的抛弃,意味着即使拟定了“感性原则”“对象性原则”的新的哲学基

调,也不过达成了终结宗教批判的历史任务,最终也没有跳出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平线。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陈启伟,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4.
- [3] 张一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劳动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三笔记再研究[J].学术界,2021(7):5.
- [4]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4.
- [6] 卜祥记.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2.
- [7] 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19.
- [8] 卜祥记.马克思早期经济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45.
- [9]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第1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75.